



返回首页

各期目录

各期文章

文章搜索

文章标题

搜索

试论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毛卫平

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者：编辑部 发布时间：2006-10-19 阅读：4787次

[摘要] 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是和谐哲学。和谐哲学是与斗争哲学相比较而存在的：斗争哲学是革命党的哲学，是质变的哲学、革命的哲学；和谐哲学是执政党的哲学，是量变的哲学、建设的哲学。要自觉地实现从斗争哲学向和谐哲学的转变。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哲学的基础上，构建适合今天需要的和谐哲学。

[关键词] 和谐社会； 和谐哲学； 斗争哲学

[中图分类号] B02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801 (2006) 04-0017-07

[收稿日期] 2006-07-03

[作者简介] 毛卫平(1950-)，男，江苏通州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主任，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问题研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愿望，符合我国社会现阶段的国情，合乎社会发展的规律，对于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推动我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了进一步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自觉性，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和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它包含非常丰富的内容，可以概括为“和谐哲学”。对于“和谐哲学”，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理解。但要合理地构建“和谐哲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

一 和谐哲学与斗争哲学

“和谐哲学”是在我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取代“斗争哲学”而提出来的。因此，只有在与“斗争哲学”的对比中，才能弄清它的确切含义。

以往，人们常常把“斗争哲学”与矛盾的斗争性相联系，而把“和谐哲学”与矛盾的同一（统一）性相联系。但是，任何矛盾都包含斗争性与同一性两个方面。“斗争哲学”不能不讲矛盾的同一性，“和谐哲学”也不能不讲矛盾的斗争性。

那么，“斗争哲学”与“和谐哲学”的区分究竟何在？我认为，所谓“斗争哲学”，虽然也讲统一，但斗争的目的是为了打破这个统一体；而所谓“和谐哲学”，虽然也讲斗争，但斗争的目的是为了维持统一体的存在及其更好的发展。二者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所处的阶段不同，出发点和目的也不同，这是它们的根本区别。斗争哲学是事物处于质变阶段的哲学，是革命党的哲学，是革命的哲学；而和谐哲学则是事物处于量变阶段的哲学，是执政党的哲学，是建设的哲学。

关于“斗争哲学”的含义，毛泽东曾经有过两次具有代表性的表述。1945年4月24日，他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指出，“有人说我们党的哲学叫‘斗争哲学’，榆林有一个总司令叫邓宝珊的就是这样说的。我说‘你讲对了’。自从有了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他们就向被压迫的人民进行斗争，‘斗争哲学’是他们先发明的。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哲学’出来得比较晚，那是斗争了几千年，才有了马克思主义。”[1]1959年8月16日，他在一个材料上批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2]“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2]两次讲“斗争哲学”，尽管相隔多年，但基本意思没有变，都不是一般地讲矛盾的斗争性，而是和阶级斗争、和革命紧密相连的。这个含义，在《湖南农民考察报告中》就有表述。当时，有人非议农民的革命斗争，认为他们“过分”。毛泽东针锋相对地回答说：“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3-1]所谓“过正”或“过分”，就是质变，就是革命。1937年8月，毛泽东对斗争哲学的含义作了规范的哲学表述。他说：“共

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3-2]粗略地看，这一段话说的似乎是共产党人的全部任务和辩证法的全部道理。但只要细加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在阐述这个问题时，是立足于“转化”、立足于“革命”而言的，讲的是共产党作为革命党的任务和辩证法的部分道理，即“斗争哲学”的道理。

这种斗争哲学的道理曾经是正确的，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如果说有错误，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后来把它用到了不适当的地方。

和谐哲学是作为斗争哲学的对立面提出来的。它指的是事物的量变阶段，是适用于社会和平发展时期的一种哲学。这种哲学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大的影响，即所谓“和”“合”哲学、中庸之道。对于中庸之道的实质，艾思奇在1934年就作了明确的揭示。他认为，中庸之道实际上说的就是事物量变阶段的道理，只不过是把它绝对化了。他说：“在黑格尔，那论理学的质量篇中所说的一切，正符合这中庸教义所根据的事实。”[4-1]“全世界各民族，对于这一点也多少总有一点知道，有所表白；不过所表白的方式各不相同，中国人特别夸大成为中庸的教义，而其他民族国家则有其他的说法罢了。”[4-1]中庸之道用于说明量变的道理，有它的合理性。但是把这个道理绝对化，用来反对社会的革命变革，反对质变，就变得保守、反动，是错误的。

冯友兰先生曾经有过类似的理解。他说：“任何革命都是要破坏两个对立面所共处的那个统一体。那个统一体破坏了，两个对立面就同归于尽，这就是‘底’。革命到这个程度就‘到底’了。”[5-1]斗争哲学是这一阶段的哲学。随着这一阶段的结束，斗争哲学也随之完成使命。在新的统一体中，人们的地位转化了，“革命家和革命政党，原来反抗当时的统治者，现在转化为统治者了。作为新的统治者，他们的任务就不是要破坏什么统一体，而是要维护这个新的统一体，使之更加巩固，更加发展。”[5-2]他说：“这是一个大转弯。在任何一个社会的大转变时期，都有这么一个大转弯。”[5-2]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事物的发展，有量变阶段和质变阶段之分，是从量变到质变、又在新质的基础上继续量变的螺旋式上升过程，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的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所揭示的内容。它体现在社会历史领域，就是从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保障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量变阶段，到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需要通过社会革命变革生产关系的质变阶段，然后又在新的生产关系基础上展开量变的螺旋式上升过程。

根据这个原理，首先，我们可以看出，主张斗争哲学与和谐哲学，各有其合理性。关键在于要适合社会发展的相应阶段。马克思主义既说明了社会革命发生的必然性，又强调革命不是随意发生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6]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根据。过去，我们研究斗争哲学、质变的学问较多；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所面临的历史使命，因此，有必要更多地研究量变的学问，努力构建和谐哲学。

其次，我们可以看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我们今天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这个基础。但是，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并不是所有矛盾的解决，在此基础上研究和解决各方面的问题，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要完成的使命。

再次，我们可以看出，和谐社会有不同的层次和水平，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崇高社会理想。我们要为实现这个理想而奋斗，又要顾及当前的历史条件；我们可以借鉴历史的经验，但又绝不能照搬照抄。

总之，和谐哲学包含丰富的内容，只有全面、系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加以深入研究，才能说明和谐哲学并构建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

二 和谐哲学与传统文化

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斗争哲学，和谐哲学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过去靠马克思解决问题，今天要靠孔夫子解决问题。有人说：孔子重“和”，“在中国文化史上，孔子是绝对的精神领袖。”[7]这些说法都有片面性。

孔子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但是，历史的事实是，孔子在历史上的作用，并不总是积极的。大体说来，革命变革时期，他不受欢迎，还常常受到激烈批判。而在和平发展时期，他的学说受到高度重视，能够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究其原因，在于他的主导哲学思想是反对变革、反对质变的“和”的哲学，而非主张革命变革的斗争哲学。他主张的“中庸”思想很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特点。

艾思奇在1934年写的《中庸观念的分析》一文中指出：“若把中庸当做事物存在的原理之一看，那就不用今日的哲学标准来衡量，它仍可以保持其一面的真理性。”[4-1]中庸思想的问题在于：“它从事物中取出他们眼中所认为的绝对的善，而要求人类能依着他们所定的标准将行为固定化。这表现他们保守的本质。他们所要求的不是前进，不是变化，而是凝固。这对于宇宙的现实就发生了冲突。”[4-2]艾思奇到达延安后，就此问题与毛泽东有过交流和探讨。在他编辑的《哲学选辑》中有关文字下，毛泽东划了杠，写下批语，指出，中庸观念“在于肯定质的安定性”，并指出：“旧统治阶级的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是反动的

方法，用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使旧质绝对化。马克思主义的两条战线方法是革命的，只承认质的相对安定性，没有绝对主义。”[8]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革命变革时期，老一辈革命家着重指出了孔子思想的保守性、反动性，但并没有因此否定其相对的真理性。同样，今天，我们在肯定孔子思想的相对合理性的时候，也不应否认其局限性。

就整个中国文化而言，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史上，既有相对稳定的量变时期，也有激烈变革的质变时期。相应地，就应该既产生和谐哲学，也产生斗争哲学。可是，在很长时期内，“和”的哲学影响巨大，传统文化几乎与“和”的哲学画上了等号。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中国社会自秦汉以来，长期处于封建社会阶段，没有发生根本性的社会变革。与此相适应，占统治地位的，就是如何维持稳定并在稳定中发展“和”的哲学，而不是以打破旧的统一体为目的的“斗争哲学”。

其次，在历史上，虽然也曾发生过企图推翻统治者、改变社会面貌的起义和斗争。但与漫长的封建社会相比，毕竟所占的时段较短、力量较小，其哲学思想也未能得到充分的表达和发展。与此相反，为统治者所需要和支持的“和”的哲学，却被人们一再加以阐释并得到广泛传播，成了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以至于到了近代，当社会需要一次革命的荡涤之时，从传统意识形态中都难以找到适用的思想根据，因而迫使先进的中国人不得不向外寻找支持革命的思想武器。毛泽东在回忆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时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9-1]但是，在那些书中，并没有讲中国革命该怎么搞，“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9-2]因此，毛泽东说，他读那些书，只取了四个字：“阶级斗争”，然后就去研究中国的阶级斗争问题。

从这一段历史可以看出，与阶级斗争密切相关的“斗争哲学”，从根本上说，出自中国社会特定时期的客观需要。而其直接的思想来源，则是马克思主义。

应当指出的是，“斗争哲学”虽然来自马克思主义，但已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的改造，变成了中国文化、中国传统的一部分，并且弥补了以往传统文化中的薄弱环节。中国有了这一段历史，再说中国文化、中国传统的特点只是“和”的哲学，其片面性就更为突出。人们不禁要问：难道红色文化就不是文化，革命传统就不是传统了吗？

今天，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其使命也从破坏一个旧世界转为建设一个新世界。这种地位和使命的转变，要求其哲学从“斗争哲学”向“和谐哲学”转变。这时，传统哲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价值就跟过去不一样了。我们应当而且可以从其中吸取更多有益的东西。

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今天所需要的“和谐哲学”，虽然可以从传统的“和”的哲学中汲取营养，但却并不是简单地回复到古人“和”的哲学，而是需要进行理论创新的。这种创新，应当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合乎时代要求的实践基础上，汲取传统哲学中有益的营养，创造出新的理论成果。这一过程，既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挥指导作用，又会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应当大力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过去虽然包含、但却没有充分展开的部分，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变得更加适合时代的需要。在这个意义上，今天所需要的，不是简单地回复到古人，而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三 从斗争哲学到和谐哲学

从斗争哲学转向和谐哲学，是社会发 展在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但是实现这一转变，却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李瑞环同志曾经感叹：“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否定和的思想的斗争观念和习惯根深蒂固，很难被摒弃。”[10]

早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布哈林曾提出社会发展平衡规律的理论。他指出，没有平衡，社会就不能长期存在，就要灭亡。同样，社会主义建设也需要平衡。他强调了两个方面的平衡。一是经济关系的平衡，即各种经济成分要有适当的比例。他说，如果无产阶级不能正确地规定这个比例，拿到自己手中的东西太多，超过了客观情况所允许的限度，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下列形势：生产力不会得到发展而会受到束缚；无产阶级不可能组织一切，无产阶级不可能强制地用自己的计划去代替拥有自己的个体经济的小生产者、小农。二是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的平衡。他认为，按照平衡规律的要求，工业化的速度，必须与农业能够提供的可能性相适应，不能“迷恋超速度”。他反对所谓最大限度地把资金从农业抽调到工业以保证工业快速发展的做法，反对用加重农民负担的办法来发展社会主义工业。他说，只有在农业迅速增长的基础上，工业才能持续保持最大的速度。他认为，工农业的发展要保持平衡，要留有后备，不能用“未来的砖”去建造“现实的工厂”。同时，他也十分重视城乡之间的平衡，他认为，“这个问题是决定人类命运的问题，因为它是一个最重要、最复杂的问题。”[11]

布哈林的这些观点被实践证明是有道理的。但在当时却遭到了严厉批判。其平衡理论被说成是“否认事物的内部矛盾，否认内部矛盾的斗争是发展的源泉”[12]，“造作了一种可笑的‘阶级斗争熄灭论’”[13]。

类似的批判也发生在中国。1963年11月，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在讲课中说到，“合二而

”是中国古代关于对立统一的光辉思想。事物既是一分为二的，也是合二而一的。对立统一规律也可以用“合二而一”来表达。他的这一观点，引发了哲学界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大讨论，更招致了一场政治批判和政治迫害。

1964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的吧？同年8月15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对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说：“一个吃掉一个，大鱼吃小鱼，就是综合。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说综合就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世界上有什么不可分割的联系？有联系，总要分割的。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14]他还说，“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哲学？”[14]“搞哲学的人以为第一是哲学，不对，第一是阶级斗争。搞阶级斗争，才搞哲学。”[14]

当时，颇具权威的《红旗》杂志发表《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一文，认为：“杨献珍同志在这时候大肆宣扬‘合二而一’论，正是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帮助现代修正主义者宣传阶级和平和阶级合作，宣传矛盾调和论。同时，也是有意识地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给他们提供所谓‘理论’武器。”[15]

由此可见，“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争论，实际上是斗争哲学与和谐哲学的争论。“一分为二”是与“阶级斗争为纲”相联系的，是“斗争哲学”；“合二而一”是被当作斗争哲学的对立面来看待的。它的罪名就是“阶级调和论”。

如果说批判杨献珍、坚持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斗争哲学是自觉的行为，那么作为批判对象的杨献珍提出与斗争哲学不相同的和谐哲学的观点，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自觉的。杨献珍曾不止一次地表示：“当提‘合二而一’时，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要去反对毛主席的‘一分为二’。”[16-1]“我没有把‘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对立起来过。”[16-2]

这种情形在历史上并不少见。中国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是社会变革的思想先导，参与争鸣的各家本来都是各个阶级或阶层的代表。但是他们当时还意识不到这一点，此后很长时间内，人们都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只是自认为或被认为某个“学派”的代表人物而已。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艺术家们，本来充当的是社会转折时期思想先锋的角色，是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但他们当时也无这种自觉。他们认为自己所做的只不过是“复兴”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文艺而已。恩格斯尖锐地指出：“这个时代，我们德国人由于当时我们所遭受的民族不幸而称之为宗教改革，法国人称之为文艺复兴，而意大利人则称之为五百年代，但这些名称没有一个能把这个时代充分地表达出来。”[17]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在历史上成为一定阶级和势力的代表。

“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讨论延续了几十年。随着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提高，斗争哲学逐步被否定、被放弃。而“合二而一”则逐步演变为“和”的哲学、“和谐哲学”。这个过程，正是和谐哲学取代斗争哲学的过程。

四 和谐哲学与构建和谐社会

和谐哲学是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它能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重要的启发和指导。

（一）准确定性，正名成事

和谐哲学是一种研究量变的哲学。所谓量变，总是在一定质的基础上展开的量的变化。因此，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准确地认识和把握事物的质。按孔夫子的说法，就是要“正名”。

准确把握社会性质十分重要。因为它关系到目标、任务、政策，从而关系到所有行动的确立，最终将关系到事业的成败，如孔夫子所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18]

准确把握社会性质十分不易。像孔夫子那样，硬要把变化了的社会现实塞进过时的“名”下，显然行不通。相反，让“名”超过“实”，思想超越社会实际的发展阶段，也会造成名实脱节。

革命取得胜利以后，由于我们对社会性质把握不准，犯了“左”的错误，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新时期政策的制定，是以我国社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正确判断为基础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状况究竟怎么样，它正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历史阶段？这个问题已成为改革所面临的最根本性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如果不明确地予以回答，改革将很难取得人们的理解，因此改革也将难以理直气壮地进行下去。”[19]有学者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是为目前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程度正名。这种正名很重要。名正不仅言顺，而且更重要的是利于行，即有利于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自身的改革。”[20]

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在基本性质不变的情况下，不仅有量变，还有部分质变，有小阶段的划分。敏锐、准确地把握这种变化，是调整政策、实现和谐的基本依据。

（二）守卫两端，防止变质

辩证法指出，事物的质有相对的稳定性。在一定的量的范围内，事物的质可以保持，但是超过了这个范围，就要向别的质转化。在事物的质变阶段，这种转化有利于事物的发展，应当积极促成；而在事物的量变阶段，这种转化会危害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应当尽力避

免。这就需要守住两端，即辩证法所说的“关节点”。按毛泽东的说法，就是要“两条战线作战”。

就我国当前的性质来说，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承认这一性质，保证这一性质的相对稳定性，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政策，社会才能顺利发展，反之，无论是否定社会主义，还是否定初级阶段，都会越过界限，使事物的性质发生改变，影响事物的发展，甚至造成灾难。因此，邓小平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21-1]他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21-2]

由此可以看出：在事物发展的量变阶段，守住两端，是重大原则问题，是绝不能退让的。合格的政治家对于这一点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立场。

要守住两端，首先必须清楚地认识两端。而这是不容易做到的。比如说在分配问题上，平均主义不对，贫富两极分化也不对。那么界限到底在什么地方？国外有一个基尼系数可以参照，我们自己还需要有自己更确切的答案。此外，在一系列问题上都需要找到这样的答案。

（三）统筹兼顾，共同发展

要使事物发生质变，就要通过斗争，“一个吃掉一个”；而在量变阶段，则必须采取“统筹兼顾”的办法，使事物的各个构成要素、矛盾的各个方面各安其位、各尽所能、各得其所。

在实际工作中，统筹兼顾就是要正确地解决许多“两难”问题。解决“两难”问题，既不能采取一个吃掉一个的办法，也不能采取平均主义的办法，而只能是根据需要和可能，确定正确的原则，做到公平正义，才能保证社会的正常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新的矛盾会产生，旧的矛盾也会有新的变化，甚至会出现“矛盾突显期”，只有通过“损益”、调整，才能保持生机和活力。应当看到，即使是在矛盾突显期，保持社会稳定仍然是解决问题的前提。改革并不是要推翻基本制度，而是要使它更加完善。我们说，改革是一场革命，只是就特定含义而言，如体制改革，目的是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不是要摧毁它。

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政策，既克服了平均主义的弊端，又平复了“阶级斗争为纲”所造成的伤害。迈开了从“动乱”走向“和谐”的步伐。

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依据我国当前的实际，兼顾了不同的所有制和不同的分配方式。

十六大报告指出：“在我国社会深刻变革、党和国家事业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把一切积极因素充分调动和凝聚起来，至关重要。”[22-1]在新时期之初，邓小平就带领全党果断地平反大量冤假错案，纠正对待知识分子的不公正态度，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其后，江泽民又带领全党解决正确对待“新阶层”的问题，指出他们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新一届领导集体着重解决正确对待农民及分配不公等问题，使人际关系不断得到调整。

在正确解决一系列具体问题的基础上，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正确方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和谐哲学的充分体现，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强化管理，长期执政

恩格斯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23]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社会要稳定和发展，首先要改变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及相应的上层建筑，使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这个任务不完成，社会发展受到严重束缚，社会和谐也就无从谈起。但在革命取得成功，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建立起来以后，加强管理就成为一个突出的课题。

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产生，往往要经历一个适应期、过渡期。一种新的、好的制度，如果没有适当的管理保证它正常运转。新制度的优越性就发挥不出来，甚至会产生严重的问题，从而使适应期、过渡期成为危险期。

秦王朝的建立标志着新的封建制度的确立。按说，社会应当欣欣向荣，顺利发展。但实际情况却是很快就灭亡了。它灭亡的原因，不是新的封建制度不如奴隶制度好，而是在这个制度基础上的管理发生了严重的问题。汉朝吸取秦灭亡的教训，在不改变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改善社会管理，抑黜百家，独尊儒术，使社会趋于和谐，实现了“长治久安”。

资本主义制度与封建制度相比，具有巨大的优势。但资本主义社会的早期也曾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甚至面临革命的形势。后来，转危为安，继续发展和繁荣，加强管理是一个重要原因。西方管理学大师德鲁克认为，泰勒与马克思、达尔文等人一样，也应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马克思、达尔文以其革命性的思想推动了社会发展。而作为科学管理奠基人的泰勒，则以在既定社会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和谐关系为追求，通过加强管理推动了社


会的繁荣和进步[24]。在资本主义最近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在社会管理、企业（组织）管理、个人管理的各个层面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这也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制度，它代表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愿望，应该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但是，它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兴盛之后，却遭受了严重的挫折。究其原因，除基本制度方面不够完善以外，管理的落后是一个重要方面。列宁极为重视管理。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年，他就明确指出：“目前时局的全部特点，全部困难，就是要了解从主要任务是说服人民和用武力镇压剥削者转到主要任务是管理这一过渡的特征。”[25]他说：“只有解决（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这项任务以后，才可以说，俄国不仅成了苏维埃共和国，而且成了社会主义共和国。”[25]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明确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深入研究社会管理规律”[22-2]。这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文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16.
- [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451.
- [3] 毛泽东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7[-1]，330[-2].
- [4] 艾思奇文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69[-1]，73[-2].
- [5] 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251[-1]，252[-2].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
- [7] 棠溪.孔子重“和”[N].光明日报，2006-01-10（11）.
- [8]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368.
- [9]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1[-1]，22[-2].
- [10] 李瑞环.学哲学 用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578.
- [11] [苏]尼古拉·布哈林.过渡期经济学[M].余大章，郑异凡，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68.
- [12] [苏]罗森塔尔，尤金.简明哲学辞典[K].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192.
- [13] 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382.
- [14] 吴江.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M].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97.164.
- [15] 本刊报道员.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J].红旗，1964，（16）：11.
- [16] 关山.杨献珍研究资料[G].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313[-1]，314[-2].
-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1.
- [18]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133-134.
- [19] 吴江.政治沧桑六十年[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247.
- [20] 吴江.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62.
- [21] 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84[-1]，370-371[-2].
- [22] 编写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读本[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4.204[-1]，72-73[-2].
-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23.
- [24] [美]彼德·杜拉克.彼德·杜拉克读本[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17，20.
- [25] 列宁选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77.

(责任编辑 刘海静)

 打印本页 |  关闭窗口

联系邮箱：wil.liam@sina.com © 2004 电话：62805370

Copyright © 2004 10.1.10.65. All rights reserved. Design by owen